第一章　局部抗战阶段的湖南时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尽管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但部分爱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先后发动了江桥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局部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局部抗战阶段，湖南遭受着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不但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而且促进了南京政府和省政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为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了湘鄂赣等4块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各根据地总共拥有数百万人口，30多个县的范围，五、六万红军和30多万赤卫军、游击队；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上万名红军游击队员以及数百万经受残酷战争考验的根据地人民，成为日后湖南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湘经济掠夺加剧

一、帝国主义在湘掠夺网的建立

1939年，毛泽东在论述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用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民大众。’① 帝国主义在湘剥削网的建立从长沙、岳阳开埠以后就已开始，到抗日战争前达到顶峰，各种洋行遍及数十个行业和长沙、常德、湘潭、衡阳、岳阳等城市乃至穷乡僻壤。

这些洋行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在湘设立的进行经济剥削和侵略的基地，很多是外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有些属跨国公司性质。它们长期垄断湖南的进出口贸易，是帝国主义在湘剥削网的主体部分。湖南各种农产品向口岸集中，帝国主义国家许多工业品向湖南推销，都由洋行代理。洋行通过买办和代理商把它的魔掌深入城乡各地，利用城镇牙行、货栈、贩运商和座庄等原有商业系统构成一个庞大的剥削网络；它们决定进出口商品的基本价格，控制市场价格水平，垄断了湖南的经济命脉；它们除进行经济掠夺外，还以填报销售报表形式，规定各级分支机构定期汇报，或派出业务人员外出调查，搜集各地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民情风俗，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

抗日战争前，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洋行除垄断湖南进出口贸易、航运、石油、冶金、矿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外，还渗透到工业百货、南货、银行、纱布、五金机器、颜料、电器、文化用品、煤炭、保险、西药等 20 多个行业，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情都干，甚至进行赌博、贩买鸦片、设妓院等伤天害理、毒化社会风气的勾当；并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其侵华政策服务。这些也是促使湖南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深层原因之一。

二、帝国主义对湘经济垄断和掠夺的加强

新军阀在湘统治建立后，帝国主义对湖南的经济侵略较大革命时期大大加剧了，这与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分不开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92 页。

的。这次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长达 4 年之久，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 37％,世界贸易额减少 2/3,失业人数高达 3000万人以上。其中，1931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工业总产值比 1929 年减少 1/3,对外贸易额比 1929 年几乎减少一半，工人失业人数达 300 万。各国的经济危机到 1934 年后才开始复苏，至 1937 年下半年又开始了新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和转嫁经济危机，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提高进口关税，限制进口；放弃金本位，采取货币贬值政策，降低生产成本，将大量商品倾销到殖民地附属国；特别是美国厉行白银政策，使中国白银外流，入超激增，这些对湖南的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的打击尤为严重。帝国主义控制湖南经济，垄断湖南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 11 个方面。

1. 垄断航运业和储运业，排挤、打击湘省民营航运业和堆栈储运业。本来，航运业是国家交通命脉，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早在 17世纪就设“航海条例”，既不使别国船只闯入内河，也限制外国船只在沿海航行。但中国由于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航运主权早被帝国主义侵夺。据 1936 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帝国主义在湘先后经营航运业的公司就有 7 个。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商船在湖南航路上载货搭客，使湖南民营小火轮航运事业和旧式帆船运输业都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当时中国的海关是帝国主义控制的，轮船装卸客货事先须经海关检验，并缴纳税款才能装卸，否则以违法走私论处，而海关检验员对外国轮船处处方便，对中国轮船则处处刁难，使湖南民营航运业无法与之竞争；外轮甚至恃强呈凶撞沉民营轮船。 1929 年 2 月，1 艘岳阳民船装载 30 多名旅客，从渔码头行到洞庭湖与长江汇合的荆河口，被美孚洋行的“美虹”油轮撞翻，美国人不予施救， 迳向汉口扬长而去，造成淹死旅客 10 余人的‘荆河口惨案”。岳阳渡口的人“上告”，海关反而说渡船刮坏了“美虹”号油漆，必须由政府赔偿修理费。1936年“美虹”油轮又在岳阳广兴洲把长津公

司的“双辉”轮撞沉，使该轮 20 多名员工失业。

各国商人还在全省各地垄断堆栈运输业务。当时在长沙的 31 家日商、22 家英商、20 家德商、8 家美商、5 家意商、1 家法商共 87 家外商在湘江东岸上起晏家码头，下迄木码头共建 11 处码头；还在湖南内河沿岸各城镇，长沙、常德、益阳、衡阳各港口均设有堆栈仓库，经营堆栈运输业务，垄断了矿产品、棉纱、布匹、百货、烟草、石油等储运业务的全部或大部，排挤、摧垮湖南堆栈运输业。

2. 独占石油市场。当时湖南的煤油、汽油、机油市场完全被美英洋行独占。美商美孚火油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先后在长沙、望城、常德、衡阳、益阳，以及湘潭、衡山、湘阴、岳阳、醴陵、津市等地建有油池 10 余座，并在长沙、衡阳、常德、邵阳、祁阳、株洲、浏阳、平江、衡山、靖港、新市等地设有 20 多处商品经销处。美商德士古煤油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支公司抗战前在长沙、常德、衡阳、益阳、湘潭等五地设有煤栈，在长沙、衡阳、常德、邵阳、益阳、津市、洪江、湘乡、湘阴、祁阳、攸县、永安等 18 处设有经销处。英商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在长沙、衡阳、常德、湘潭、益阳、洪江、津市、靖港、新市、渌口等 9 处设有油池，最大的长沙油池能储油 100 多万加仑，并在长沙、零陵、祁阳、沅陵、醴陵、郴州等 26 处设经销处，完全垄断了湖南的煤油、机油营销业务。1930 年前后，湖南石油销量，美孚公司占 1/2，亚细亚公司占 3/10，德士古公司占 1/5，形成 3 家外商独占的局面。1928 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组建光华火油公司，1930 年起包销苏联“油遍地公司”出产的“红星”牌煤油，改为“光华”、“国光”商标听装，于 1934 年在湘设长沙光华煤油公司（由谭常恺任董事长），即受到 3 家外商联合排挤：或利用海关刁难，或令各地洋行将销价降至光华煤油成本之下，（即由每对 10 银元降至 5 元甚至 3 元 6 角），放盘倾销，使光华赔本破产，沦为美孚公司的附属机构。在光华公司破产后半年，3 家外商又 2 次提高油价，第 1

次每对涨至 7 元 6 角，第 2 次涨至 9 元 6 角，完全操纵了煤油市价。长沙大西门河街镇记洋烛号，自制蜡烛以博蝇头之利，从美孚行进白蜡(石蜡),制成仙帽牌蜡烛(影射亚细亚的僧帽牌),畅销市面，美孚等洋行唯恐影响自产鹰牌洋烛销路，即联合烂价抛售，并以劣质白蜡供给镇记，使镇记蜡烛一遇高温就自行弯曲溶化，信誉大失，无法经营。

更有甚者，帝国主义一贯坚持以武力推行经济侵略的政策。1932 年，湖南公路局对美孚等 3 家洋行分配销售汽油的办法不满，特别是想拒售德士古的劣质汽油，并对各油行将汽油价格陡涨 30%以上带来汽运成本太高有抵触，将美孚洋行经理郑旭熙送长沙县府扣押。美孚大办巴登竟电告汉口支行，由汉口美国领事与驻汉美海军司令率美舰来长沙向省主席何键兴师问罪，迫何立即放人，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各洋行每年从湘刮走的财富仅以 3 家油行为例，湖南美孚公司每年向上海美孚总行汇款 240 余万银元，加上亚细亚 240 余万银元，德士古 100 余万银元,共计 600余万银元。据统计，3 家洋行的利润为成本的 10 倍,故除了成本，3 洋行每年从湖南人民身上刮走 500 多万银元的利润。这些洋行当时就被湖南爱国人士称为“插在湖南人民身上的吸血管”。

3. 大量倾销香烟,垄断香烟市场。英美烟草公司凭借特权,利用我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力，直接在我国设厂生产，只需向我国政府交纳统税就可在全湘畅通无阻；另一部分从国内运来的香烟则利用我国关税实质上还不能自主，进口税率极低，或利用兵舰偷运进口，走私漏税等办法，运销全省各地。这两部分洋烟都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作庇护，运销我省，再用联合降价，欺骗宣传，偷窃国产香烟情报，收购国产烟使之霉变后要求斟换等极为恶毒的手段，来打击和排挤我国民族香烟工业，达到垄断香烟市场的目的。1928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白金龙”香烟，可与英美烟公司的“前门牌”竞销，英美烟公司就大批收购使之变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去斟换,或以烂价等手段加以排挤。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中国华昌烟草公司自 1929 年开业后,生产“曼丽牌”、“岳麓牌”和“革命牌”香烟，很受群众欢迎，但不到 3 年便被英美烟公司于 1930 年挤垮了。上海中国兴业烟草公司出产的“照相牌”香烟，附有火柴，在湘走俏，立即引起英美烟公司湖南分公司嫉视，该公司大量收购并囤积该烟，雇用大批临时销售员烂价出售，站街叫卖，迫使小烟商无法推销“照相牌”烟，从而使这家烟厂关门。这样，湖南和中国各地民族烟厂就无法在湘立足。 1937 年前，英美烟公司垄断了湖南香烟销量的 85％，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其他国产香烟的销量压至 15％ 按英美烟公司在湘销烟 50000 箱(每箱 50000 支),每箱价 100 银元计算，每年销售金额为 500 万银元，当时香烟利润在 50％以上，仅该公司每年就可从湖南夺去近 300 万银元。

4. 垄断桐油收购和出口。桐油本是湖南出口的大宗产品，从民国初年起，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我省最大的桐油集散地——常德设立洋行，大肆收购湖南桐油。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完善的设备，逐渐垄断了桐油市场，并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进行不等价交换。1929 年下半年起，为转嫁经济危机，他们指使各洋行首先把桐油收购价由每担 40 元,提高到 176 元，待油贩把大批桐油运至常德，他们又突然把桐油价压低到每担 21 元，这时中国油商无法把货运回，而毛油又必须经过这些洋行提炼才能出口，迫使中国油商忍痛成交，造成常德地区油行业资金损失 80％,该地区 13 家中国油商倒闭 8 家，其中仅沅陵一地区就有义丰源、德厚昌 2 家油行完全破产，其他各地损失成本也在 30％以上。种植油桐的农民也因油价太低和油行倒闭的影响，生计益感困难；一些农民感到采桐籽榨油不如将桐树烧炭卖掉合算，出现了砍树烧炭，桐山荒芜的悲惨景象。1936 年各国洋行又以同样毒辣的手段造成湖南桐油业的巨大损失。正是在造成中国油商和桐农日益贫困破产的基础上，洋行获得了超额利润，美商施美洋行在 1937 年前的

10年内获利 300 万银元。在施美洋行支持和卵翼下的义瑞行也成了湖南最大的桐油买办商。为了给施美洋行代收桐油，义瑞行曾在常德、津市、长沙设行，并拥有 3000 吨储油设备，700 吨附设提炼装置,从 1928年至1937 年输出桐油 20.5154 万吨,获利 250 万银元，10年间获利为资本的 125 倍。义瑞行还利用其雄厚资本与竞争力，打垮了华商中原公司。

5. 操纵茶叶国际市场，造成湘茶减产。茶叶原系湖南出口大宗，各国茶商及晋、闽、粤、苏、鄂、赣等省茶商曾相继来湘采购，每百斤红茶折合大米高的达 38担，一般也在 10—18 担米之间,有“斗米斤茶”之说,故 1916 年前每年收购 40—60 万担,最高年份收购各类毛茶百余万担。后因英日等国采购茶种在属地印度、锡兰、台湾（当时是日本属地）等地种植，逐步达到自给有余，遂以倾销手段劫夺华商国际销路；特别是许多销茶国提高华茶关税(如英国于 1932 年 5 月提高华茶关税 1 倍,使每担华茶课税 50 两[①]）而对属地红茶入口不加征，从而使华茶国际市场堵塞，茶价波动频繁，收购量时起时落，一般每年收购茶叶 40 万担左右，最高 80万担，最低仅 10 余万担。湘茶一步步走入衰落时期。

6. 大量倾销洋面洋米,造成湘省面粉业萧条,米价下跌。1914 年前，我国面粉工业尚不发达，面粉输入甚巨；1914 年欧战发生，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加以粮食缺乏，又不能外销，我国一跃而成为大宗面粉输出国。民国 10年面粉出口一百几十万担，次年一反输出国为输入国，从此湖南也由面粉输出转为输入。 1931 年,湘省输入面粉 20万担,价值 83.1548 万关平两；1932 年输入 20.0714 万担，价值 77.1777 万关平两；1933年输入 16.7813 万担,价值 67.5557 万关平两；1934 年输入面粉价值 91.63 万银元；1935 年输入面粉价值 230.82 万银元。这就造成省内磨坊业一落千丈，面粉除售与酱园制酱外，找不到销路，磨坊大部被迫停业。

①《银行周报》 16卷 18号，《国际要闻》第 20页，1932 年 5月 17日。

1934 年，长沙、湘潭、醴陵、湘阴等县城镇仅存磨坊 23 家，大部营业清淡，濒于倒闭状态。①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手段，将洋米输华。1933 年，政府本已确定洋米进口征税，但 1935 年又准许洋米 130 万担“半税记账”输粤，1936 年又准洋谷、洋米各 200 万担输粤，造成行政院“关于湘米输粤以解决湘米销路”的措施无法执行。② 由于洋米占据湘米销售市场，致使湘米大量囤积，湘潭粮食堆积如山，长沙谷米存储二、三百万担，无法销售出去，造成湘省米价大跌。1930 年长沙最好的天字号机米仅售 5 元 3.4 角，上谷仅售 2 元 1、2 角；30 年代中期湘米跌至每担 5 元以下，而每担米的生产成本却在 10 元左右；③ 造成谷贱伤农，极大地打击和破坏了湖南农业生产和市面金融。正如 1934 年 3 月《银行周报》 18 卷 9 月号《国内要闻》所指出的：湘省近年丰收，却“有大宗洋米运来倾销，致湘米顿失市场。囤储既富，价格低贱，不仅农村经济陷于绝境，市面金融亦大受打击”。④故湘鄂赣皖豫 5 省主席于 1933 年 8 月联电国民党中央称：“上年各地丰收，谷米产量大增，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造成田畴荒废，隐患潜滋。”同年 10 月杨永泰在湘鄂赣等 10 省粮食生产会议上也说：洋米倾销压抑了国产粮食增长，造成了极坏的现象，即不仅灾区闹饥荒，丰收之区也闹荒，真是“丰有丰荒，灾有灾荒”。⑤

7. 低价收购和掠夺矿产，垄断矿产资源。湖南矿产资源全赖水运集中长沙，再转汉口、上海外销，产销大权全系于洋商。他们勾结中国军政当局签定专卖合同，操纵中国铅锌市场，掠夺了湘省大量矿产资源。如美商慎昌洋行在订购水口山铅砂时，曾在

①《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七编第四章，民国 24 年 10 月初版。
②《银行周报》民国 21 年第 13 期，《国内要闻》第 4 页，1937 年 4 月 6 日。
③《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618、620 页。
④同上，第 620 页。
⑤同上，第 617 页。

合同中强行规定“即以此为定价,不得卖与别行,亦不得提炼成铅”,妄图垄断铅锌出口。自 1905 年至 1933 年，各国洋行以低于国际市场牌价 60%的价格，收购水口山铅砂 40 多万吨,占这一时期水口山矿砂总产量的 73%。当时矿砂国际市场牌价平均每吨 41.25 银元，而开采一吨矿砂所付矿工工资仅 0.31 元,占 0.75%；原材料设备折旧管理费 3.85 元，占 9.33%；湖南官方得纯利 11.65 元,占 28.24% 外商所得纯利为 25.44 元,占 61.608%。总计外商仅从水口山垄断销售的 40 多万吨矿砂所获纯利便高达 1100 余万元，为矿工所得工资总和的 82 倍以上。

8. 利用关税壁垒，阻止湘绣和农副产品出口。湖南湘绣本来是饮誉世界、久负盛名的艺术珍品,1933 年至 1937 年一度出现了湘绣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省内绣庄 45 家（其中新开绣庄 16 家),绣工人数达 15000 万人,年产绣品 30000 件以上,产值约 120 余万元，行业积累达 50 多万元，绣品行销欧美。可是由于外国政府对中国商人的歧视和无法突破外国的关税壁垒，这种艺术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未能出现大宗销数，无法打开销路，而且在本国沿海进行交易也受到帝国主义海上霸权和海盗横行的打击。如 1930 年广华、锦霞二绣庄派人带 5000 元绣品去厦门销售，途遇海盗，船被击沉，连人都被英国军舰羁留而不予放行。

帝国主义列强对那些能与之争市场的货物，哪怕是价格低廉，也禁止进口。据中国商品检验局农作物种检验组 1931 年的报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禁止我国农副产品进口的品种多达近百种，包括胡瓜、西瓜、南瓜、菜豆、小麦，玉蜀黍、甜栗、柑桔、甘蔗、葡萄、苗木、亚麻、棉子、烟草、苹果、豆豉、酱油等，造成我省一些农业产品生产萎缩。①

9. 倾销洋木洋鱼，造成木材、鱼业市场衰退。竹木原系湘省出产大宗,税收最旺的 1929 年达到 97.7678 万元,占全省厘金的

①《时事新报》， 1931 年 5 月 15 日。

16.78%。[①]但因洋木输入，木材市场几乎全被夺去，加上湘西河道险阻，土匪充斥，使商旅戒途，造成木材积压，营业不振。鱼产在洞庭湖与湘资沅澧四水均称丰富，但长沙、岳阳 2 关每年进口海产鱼达六七十万关两之巨，其中洋货占 2/3，鲜鱼市场反被咸鱼、干鱼所夺，造成湘省渔业益形衰落。[②]

10. 利用教堂侵占土地，施放高利贷。1934 年，湖南安乡的天主教堂，占有农田 40000 亩以上；神父也参加高利贷剥削，每年要放出新谷万担以上。[③]

11. 垄断湖南外贸业，使湖南沦为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首先，从进口原料的性质看，湖南对外贸易历来进口货多属工业品,出口货多为原材料。自 1929 年至 1933 年进口货物中，主要是轻工制品，占 45% 次为煤油等半成品,占 35% 再次为以糖和罐头为主的食品及烟草等，占 20%，重工业品所占比重很小。如 1931 年进口煤油价值 315.2723 万关平两，鱼类海产价值 41.4143 万关平两，糖价值 180.2669 万关平两，香料与药材价值 20.9778 万关平两，颜料、染料、油漆价值 141.63 万关平两，化学产品价值 35.2645 万关平两，毛货与麻货价值 17.9129 万关平两,棉货价值 201.4102 万关平两,纸张价值 32.787 万关平两,钢铁制品价值 38.0277 万关平两,机器车辆价值 35.9428 万关平两，其他货物价值 223.390 万关平两，合计全年进口 1284.2925 万关平两。1929 年至 1933 年，湖南出口货物有 3 类：一是原料,平均每年出口 1605 万余关平两,占 77% 以上。其中种子和植物油 1000 万关平两,占 70% 以上,矿砂等四、五百万关平两,占 20% 以上；纺织原料值一、二百万关平两，占 10%。二是食品与烟草，其中粮食占 60%,年值 100 余万关平两 蔬菜占 30% 以上,年约数十

①《湖南之财政》，第 54 页

②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五篇第 1 页，1935 年。

③伍忠道：《湖南安乡县农村的税捐和高利贷》，《中国农村》第 1 卷第 8 期，第 74 页，1935年 5 月。

万关平两；茶占 12%，约一、二十万关平两。三为制造品，基本上是手工业品，其中鞭炮占 80%，年产值 200 万关平两，棉织工业品与化工产品合占 20%，约七、八十万关平两。由此可知，湖南不但以矿砂和农副产品等原料换外国的工业品，而且以原料换洋人在外省制造的商品。这无异于由湖南提供原料给外国人加工制成货物再向湖南倾销。如洋人以低价收购湘省五倍子，农民经过手摘，加工成装后，每百斤五倍子售给洋人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劳动加工值；1935 年湘省外消五倍子 56000 担，其中销往德国 50%，英国 20%，日本 15%，美国 10%，法国 5%，经过加工后，德国向我国输入高价染料，英美向我国输入高价药品，其他一些国家向我国输入有机化工产品，获利 10 倍以上。特别是占进口总数 40%的棉货、染料、纸张等洋货，湘省可以制造供应，只因帝国主义利用在华特权，垄断市场，实行倾销，使本省的这些行业，难以发展。民族工业濒于衰败破产。

一方面廉价出口原料及初级产品，另一方面高价从国外进口制成品，使湘省进出口贸易处于严重的入超地位。总计自开关以来至 1931 年的 32 年内，湖南外贸入超 4682.6193 万关平两；如加上 1932 年与 1933 年两年统计的数字，这 34 年内入超达 6000 万关平两以上。而且从 1928 年到 1933 年进口货物价格提高 9%以上，而出口价格反被压低 23%，5 年内进出口价格剪刀差扩大了 43%，[①] 湖南人民受到的剥削，比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更加严重。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日、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各国都加剧了对湘经济侵略，特别是日本，在上述各项经济侵略中都是急先锋，而且手段极为卑劣；不仅过去在湘制造了“六一惨案”“大金码头事件”，而且在九·一八后还从湘掠夺锑、锰、铅、锌等战略物资去日本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表现出格外穷凶极恶和阴险狡诈的帝国主义本性。日本利用不平等条约与其

①《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帝国主义互通声气，控制湖南海关，使海关进口税率由名义上的5%，降至不足2.5%，使长沙海关税值正税逐年下降，因而使其能畅通无阻地大量高价倾销洋纱、洋布、洋油、鸦片、五金、颜料、砂糖、洋蜡、药品、海产品、面粉，使湖南的民族工商业受到排挤而衰落；对湖南可以与之竞争的烟草、棉子等近百种农副产品则与美英等国联手禁止向其国出口，使湖南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场；尤其是日本以卑劣手段垄断和操纵湖南航运、码头、矿产、煤炭等行业，给湖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九·一八以前不久，日本日清汽船会社戴生昌轮船局和戴生昌轮船公司垄断了长沙至汉口、常德至汉口、湘潭至衡阳等15条航线，并与美、德洋行勾结，把客票价格由2元减至8角、4角，在挤垮湖南的长衡五轮公司后，他们又将客运价提高数倍，独霸长衡线，残酷剥削湖南人民。日商强租大金码头、新关码头更是10多年来长沙人民反日斗争的直接导火线之一；在长的30多家日商和其他外商还垄断了长沙、常德、益阳、衡阳等地储运业的全部或大部，排挤、摧垮了湖南堆栈运输业；日本三井洋行租办湘潭谭家山煤矿，后又转租给三家日商，采取杀鸡取卵式开采办法，乱挖滥采，造成该矿山崩地塌，至今留有痕迹。日本还在长沙、常德等地贩卖鸦片，开设赌馆和妓院，干尽伤天害理、毒化社会风气的勾当。当他们的经济侵略受到湘人的抵制后，日本在长沙的青年又组织“美乃和俱乐部”流氓组织，勾结中国奸商进行偷运和暗销日货的勾当。更有甚者，九·一八事变后，日商三井洋行，竟敢在湖南人民掀起反日斗争时，勾结长沙同昌公司等企业收购湖南锰砂、锑砂8011吨，铅砂8050吨运到日本，还勾结湖南建设厅长于这年9月至12月从长沙海关运出锑砂12.053万担、纯锑及生锑8.5252万担、白铅砂14.341万担，供日本制造军火，引起群众愤怒，迫使省政当局，将该厅长撤职查办。

帝国主义对湘经济掠夺的加剧，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湘经济掠夺的猖狂、狡猾和残酷，刺痛了湖南工人、工商业者、知识

分子和农民的心，因而在 1931 年至 1937 年的湖南《大公报》、《市民日报》等大小报刊上,经常刊登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经济侵湘的消息,发出“日货大量倾销”,“日货充斥，经济侵略可惧”,① “日毛织物独占中国市场”② 等充满愤懑情绪的言论和警告，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也唤起了湖南人民的新觉醒。具有反帝爱国斗争光荣传统的湖南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组织救亡团体，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掀起了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批评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支援前线抗日的热潮，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特别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使这一口号成了全民族的共同呼声，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又有新的发展。这次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而且促进了南京和省政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为建立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也为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组织抗日团体，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热潮

1931 年 9 月 23 日，省会长沙人民获悉“日军占领沈阳，南满惨遭蹂躏”的消息后，即有 200 多个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湖南通俗报》、《湖南工人报》、

①《湖南大公报》，1934 年 8 月 18 日。
②同上， 1935 年 3月 14 日。

《全民日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导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反日游行示威盛况，发表各群众团体的宣言通电，全省人民反日救国的热情迸发了出来。9 月 25 日,长沙工商学各界群众近 20 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日本武装侵占辽东示威大会，群情激愤，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大会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决议,将这年 7 月为抗议日本怂恿朝鲜当局残杀中国侨民而成立的湖南人民对日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推选省党部、省教育会、学生抗日会、市商会、市农会、市总工会代表为常务委员，下设总务、组织、宣传、经济绝交、义勇军等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全市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进行声援。衡阳、邵阳分别举行了 50000 人和 30000 人的游行示威大会，锡矿山有近 20000 人参加示威运动,湘乡青树坪召开了 2000 人的反日大会。省会还迅速组织了各行业各阶层抗日救亡团体：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新闻、邮电、教育界抗日救国会，长沙苏广业救国锄奸团；此外，长沙数十所中学的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湘潭、衡阳、邵阳、沅陵、辰溪、东安、城步、大庸、益阳、湘乡、水口山等 70 余县市和地区也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并分别组织了工人、学生、商民等分会。衡阳工人还组织了 5000 人的抗日义勇军。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遍布各大小工厂和其他各行业。抗日团体一时如雨后春笋，遍布全省。这些团体举办了数十种抗日救亡刊物，如《湖南反日救国会会刊》和《抗日救国半月刊》,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的《抗日周刊》,以及遍布长沙、衡阳、湘潭等全省各地的《抗日专刊》、《铁血青年》、《反日专刊》、《抗日旬刊》、《抗日特刊》、《讨倭专刊》、《反日歌谣》等等,进行宣传鼓动。全省各界还组织反日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兵营、学校、剧场、车站、码头、影院乃至偏僻山村，作演讲、出壁报、演话剧，向各界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这些宣传、抗议活动，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血腥罪行和野心，进一步激发人民的抗日义愤和爱国热情。各报大量刊登日军在东北“强占辽宁”、“屠杀我军民”、“凌辱我妇女”、“烧毁我军库”、“破坏我交通”、“劫我资源”、“夺我财富”等暴行，披露沦于日帝铁蹄下遭受的“亡国之痛”、“灭种之恨”、“呻吟之苦”，并联系1894年“甲午之战”、1915年的“二十一条”、1928年的“五三惨案”、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揭露日帝一贯之大陆政策是独吞中国，称雄亚洲和世界，提醒国人“若再坐视不理，则朝鲜、印度之惨祸，行将见于中国”。① 这种揭露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义愤，对提高人民爱国热情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二、批评南京政府和省政当局的害民误国政策，敦促当局抗日御侮。日本侵占东北后，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湖南各界发通电，交呈文，对此提出严肃批评，指出“暴日侵略我国，敢于得寸进尺，实由党国各领袖不肯牺牲成见和通力御侮”、“诸先生为党国领袖，举足轻重，系国安危。当兹外侮日亟，国运濒危”之际，只顾争权，不恤国难、“忍令大好河山资敌”，“试问这个重大罪过，今日中国之元首，该不该担负”？② 针对蒋介石幻想国联“主持公道”，制裁日本侵略，《市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对外乞灵国联，所谓国联者，一国际帝国主义分脏会议也”；③ 长沙二中抗日救国会指出，国际联盟“号称维系和平”，实则“两次决议案里使中国主权不知损失多少”，由日本担任常务理事国的国联“非但不能维系和平”，它是强者侵略弱者的工具，依靠国联主持公道，“无异老虎口中讨碎肉”。针对省政当局坚持“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政策，各报指出，不能“箕豆相煎”，“自相残杀”。各报还抗议省政当局禁止学生抗日活动的

①见《湖南通俗日报》1931年10月6日，《湖南大公报》1932年7月1日。
②《晚晚报》，1931年11月25日。
③《市民日报》，1932年9月18日。

错误作法。

这些文章、通电、呈文还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主张，希望当局采纳：①坚决要求南京当局实行抗战。他们指出“日人素具侵略野心”，“我国要收回土地”，“唯有诉诸武力一途”。①“要为国家雪宿耻，只有采取抵抗主义，实行抗日政策，与暴日拼个你死我活”。② 衡阳各界 50000 余人反日侵辽大会向全国发出“请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和“停息内争御侮”通电。当日军侵占山海关后，湖南各民众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请愿省府转电蒋介石政府，调遣全国军队抵抗暴日；当日军进犯华北后，省城各民众团体纷纷请愿，促请政府出兵抗日。②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反共，一致对外；特别指出要取消湘鄂等 9 省联防，“化除一切家族、区域、阶级，乃至感情之分歧”，坚持“捍卫民族利益之大原则，互相团结，以求民族之生存，国家之独立”。③组织请愿，要求政府组织民众义勇军，衡阳、长沙等地均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请政府发给枪支，支援前线。④要求省政当局“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启封抗日团体。⑤开展“抵制仇货”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⑥整理财政，减轻税收，实行开发实业、增加生产的“助产运动”③，等等。

由上可知，九·一八事变后持续五六年的抗日救亡宣传具有一定的深度，它不仅向全省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和野心，而且批评了南京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敦促当局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同时，这场抗日救亡宣传有一定的广度，不仅省会长沙 20 万人游行示威的规模和全省 70 多个县市集镇有救国会组织，这在全国少有，而且救亡活动开始深入农村。宁乡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各中学宣传队深入田间、农

①《湖南大公报》，1932 年 1 月 7 日，第 6 版。
②《抗日专号》第 4 卷第 4 期，1933 年 5 月。
③《湖南通俗日报》，1931 年 10 月 6 日第 3 版；《湖南大公报》，1933 年 7 月 5 日第 6 版。

舍，向“凿饮耕食之大多数农民”宣传抗日；[①] 衡阳县学生抗日会则‘将宣传大纲寄送乡村小学教师”,并请县教育局‘令所属乡村小学教师努力抗日宣传”。[②] 连地处穷乡僻壤的新田县也有农村抗日宣传队举着小红旗深入农舍宣传抗日。

这次抗日救亡宣传对团结教育人民，提高民众抗日爱国热情，推动南京政府、省政当局和驻湘部队向抗日方面转化，对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和先导作用；特别是揭开了湖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震撼三湘大地的“抗日救亡”呼声，打破了国民党政府“清乡反共”的白色恐怖局面，使各界群众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使被摧残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投入新的斗争,并与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抵制‘攘外必先安内’的害民误国政策,揭穿国联袒护日本、瓜分中国的阴谋，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民族觉悟，唤发了各界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它还推动了湖南省政当局开始缓解高压政策，反共老手何键虽念念不忘反共，但也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对抗日救亡运动采取某种附和或赞同态度。1931 年 9 月，他曾率第四路军全体官兵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实行对日宣战”，表示全体将士已‘枕戈擐甲”,准备随时出征杀敌。事实上，“七七”之前第四路军已抽调几师军队到江浙一带前线。在群众一再要求下他也拨给救亡团体一定经费或参加一些抗日集会。

二、开展深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

随着抗日救亡宣传的开展，对日经济绝交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主要表现为抵制仇货，断绝对日的供应。它不仅是对侵略者的经济制裁和抵抗，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斗争。九·

①宁乡学生《抗日特刊》第 2 期，1933 年 8 月。
② 衡阳《抗日周刊》第 2 期，1933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